

东北抗日烈士传

第二辑

东北抗日烈士传

第二辑

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地方党史研究所

编

东 北 烈 士 纪 念 馆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81年·哈尔滨

东北抗日烈士传

第二辑

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地方党史研究所 编
东北烈士纪念馆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哈尔滨市道里森林街 42号)

黑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印张11 12/16·插页 46 字数 200,000

1981年2月第1版 1981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平装 1—7,000 · 精装 1—1,800

统一书号：11093·60 定价：(精装)2.55 元
(平装)1.90 元

编者的话

为了纪念在东北抗日游击战争中牺牲的烈士，学习革命先烈艰苦卓绝、英勇斗争、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继承革命先烈的光荣传统，对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少年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并为历史研究工作者提供资料，我们组织编写了《东北抗日烈士传》，分一、二、三辑出版，每辑十五至二十万字。

选撰烈士的范围是：从1931年“九一八”至1945年“九三”东北抗日游击战争时期，参加或领导过东北抗日斗争并牺牲在东北的地下党县以上领导人，抗日联军师以上干部、英雄人物和英雄集体，抗日群众团体中有代表性的人物，以及抗日义勇军中的著名领导人；在东北抗日游击战争中有较大贡献牺牲在外地的革命烈士，也在选撰之列。

本书通过对烈士生平的撰述，反映了东北抗日游击战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违反国民党不抵抗政策，发动群众，创立武装，建立反日民族统一战线，配合全国抗战，争取最后胜利的历史；歌颂了在十四年艰苦卓绝的抗日斗争中，成千上万中朝人民的优秀儿女，为了

Folk 106

祖国的独立和民族的解放，献出宝贵生命的英雄事迹。是一部既有史料价值，又有教育意义的书。

本书撰写是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力求史实准确，评价恰当，较全面地反映每个烈士的生平事迹。但是，由于对烈士事迹材料搜集的尚不够充分，在撰写中根据每个烈士现有资料等实际情况，有的全面详细些，有的简略些，有的只有二、三事。在撰写形式和文字风格上也未强求一致。

资料来源，除我们自己掌握的资料外，还采用了过去东北三省地方党史研究部门搜集、整理的大部分资料。在这次编写过程中，对烈士的事迹又进行了部分的调查、补充和核实工作。

为了帮助读者阅读和加深对烈士的了解，书中还选入了大部分烈士的遗像、画像和部分烈士的手迹、遗物照片。

在本书编撰过程中，得到了抗联老同志的热情支持和亲自帮助、指导。他们为我们提供资料，介绍烈士事迹，提供调查线索；帮我们审阅、修改稿件，核对史实；陈雷同志还为我们写了书题字，等等。在此，向各位抗联老同志致谢！

由于我们的水平所限，本书错误和史实遗漏之处肯定会有。望广大读者，特别是抗联老同志及烈士的亲友，给予指正。

目 录

| | |
|-----------------|--------|
| 序 言 | (1) |
| 魏拯民烈士传略 | (7) |
| 李东光烈士 | (31) |
| 宋铁岩烈士传略 | (37) |
| 王仁斋烈士传略 | (51) |
| 曹亚范烈士传略 | (59) |
| 李学忠烈士 | (67) |
| 史忠恒烈士 | (71) |
| 许成淑烈士 | (77) |
| 车龙德烈士 | (83) |
| 抗日民族英雄赵尚志 | (89) |
| 许亨植烈士传略 | (123) |
| 雷炎烈士 | (137) |
| 吴景才烈士 | (143) |
| 陈庆山烈士 | (147) |
| 王学尧烈士 | (151) |
| 革命文艺战士金剑啸 | (159) |
| 李成林烈士 | (185) |
| 李延平烈士传略 | (189) |
| 黄玉清烈士 | (195) |

| | | |
|-----------|-------|-------|
| 张奎烈士 | | (201) |
| 姚新一烈士传略 | | (205) |
| 李文彬烈士传略 | | (217) |
| 壮哉！十二烈士 | | (229) |
| 小英雄姜墨林 | | (249) |
| 林贞玉烈士 | | (266) |
| 张传福烈士 | | (271) |
| 冯治纲烈士传略 | | (275) |
| 马德山烈士 | | (293) |
| 高禹民烈士传略 | | (299) |
| 李学福烈士传略 | | (311) |
| 王汝起烈士传略 | | (325) |
| 赵清和烈士 | | (337) |
| 金根烈士 | | (343) |
| 郭铁坚烈士 | | (349) |
| 抗日英雄汪雅臣将军 | | (357) |

序　　言

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地方党史研究所和东北烈士纪念馆主编的《东北抗日烈士传》由黑龙江人民出版社陆续出版。我做为抗日联军一名战士，同广大读者的心情一样，感到由衷的喜悦。这套传记尽管在资料和文字上还需要不断充实和提高，但它既不苛求于前人，也不溢美于先烈，如实地反映了东北抗日斗争的历史事实和烈士们的本来面貌，具有历史的真实性。这要算是撰写烈士传记的一个良好的开端。我竭诚希望过去那些戎马驰骋于白山黑水的老战士和广大史学工作者同心协力，写出更多更好的革命史书、烈士传记、革命人物传记来，以激励前进的人民和教育我们的后代。

周总理生前非常关怀东北抗联的干部、战士，对纪念东北抗日斗争中牺牲的中朝烈士，宣传他们的英雄事迹问题，做过重要的指示。东北三省党史研究部门和东北烈士纪念馆的同志，根据周总理的指示，做了大量的搜集整理烈士资料的工作。但是，由于林彪、“四人帮”的干扰和破坏，这项工作被砸烂了。林彪、“四人帮”及其追随者，为了实现其篡党夺权的目的，不仅打倒和丑

化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而且极力诋毁和玷污革命先烈。他们声嘶力竭地公开诬蔑东北抗联是“土匪”、“反革命武装集团”。这一小撮不肖之徒，依仗窃取的权力，不仅对活着的抗联干部、战士进行残酷的迫害，而且对许多抗日烈士加以“叛徒”、“特务”等罪名进行诬蔑和践踏，使无数英雄含冤于九泉之下。著名的抗日民族英雄杨靖宇也被诬蔑为“错误路线下的牺牲品”，而不准宣传。对于有关东北抗联的剧作，也明目张胆地进行篡改，歪曲事实，混淆视听，欺骗国人，莫此为甚。《东北抗日烈士传》的出版，不仅实现了周总理的嘱托，为人民群众学习先烈的革命精神提供了宝贵资料，而且也是对林彪、“四人帮”篡改东北抗日斗争史，诬蔑革命先烈和抗联战士的一个有力批驳，是史学战线上的一次澄清是非，拨乱反正，孰能不以此为幸。

东北抗日斗争史是我党光荣历史的一部分，也是中朝两国人民反对共同敌人的联合斗争史的一部分。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蒋介石采取不抵抗政策，几个月内，东北的大好山河就被敌人占领。在这中华民族危亡的紧急关头，中国共产党坚决反对国民党蒋介石的卖国投降政策，提出了用民族自卫战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号召，受到了东北人民的热烈拥护。中共满洲省委为了组织和领导东北人民的抗日武装斗争，派出许多领导干部深入农村，以爱国主义思想教育群众，发动群众，夺取敌人的武器来武装自己。

由此，以工人、农民和爱国知识青年为骨干的抗日武装队伍，犹如雨后春笋，在南满、东满、吉东、北满等地先后建立了十几支抗日游击队。同时，还派出许多优秀干部到救国军、自卫军及其他反日部队中去，宣传我党的抗日主张，开展政治工作，使他们坚持抗日救国，并逐步地把这些队伍改造成为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

1933年以后，中共满洲省委贯彻执行党中央和毛主席在中央苏区提出的关于反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指示精神，以游击队为基础与各种反日部队建立了不同形式的武装统一战线。并把赤色游击队改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先后成立了以杨靖宇为军长的第一军，以王德泰为军长的第二军，以赵尚志为军长的第三军，以李延禄为军长的第四军，以周保中为军长的第五军，以夏云杰为军长的第六军。在党的领导下，人民革命军各军都建立了自己的游击根据地。根据地的人民把游击队视为自己的子弟兵，送子女参军，送粮送衣、送医药等等，给游击队以全力支援；并配合游击队抓走狗、扒铁道、割电线、送情报，共同打击敌人。

1936年初，根据党中央发出的“八一”宣言精神，东北人民革命军统一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除原有六个军外，把四军二师（原饶河游击队）改编为第七军，军长陈荣久。这七个军是党领导下的基本队伍。另外，在党的协助下，以东北反日民众军、救国军和反日山林队为基础成立了抗联八至十一军。东北抗联队伍在1936年

到1937年抗日高潮时期，曾发展到四万多人，游击区扩大到七十余县。

东北抗日斗争的蓬勃发展，引起了敌人的恐慌。敌人采取治标和治本相结合的方针，在加紧“讨伐”抗联的同时，强迫实行“集团部落”政策，破坏我游击根据地。正在这时，东北抗日联军失掉了与党中央的联系，王明、康生借机插手东北，撤消了中共满洲省委，使抗日联军失去了统一领导。

1937年全国抗战爆发之后，东北抗日联军积极开展了敌后游击战，破坏交通枢纽，袭击兵站基地，给敌人以沉重打击。牵制了日军入关，有力地配合了全国总抗战。据不完全统计，在东北抗日游击战争期间，打死打伤敌人十七万二千人。仅就1940年以前，进入伪“建国神庙”的所谓“神位”就有四万八千人。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之后，日本帝国主义对东北加强了法西斯统治，破坏我地下党组织，毁灭我游击根据地，疯狂“讨伐”抗联部队。东北抗日联军各部队，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转战在丛山密林，冰天雪地里，经常与多于自己几倍，甚至几十倍的强敌进行殊死博斗，其英勇精神感动中外。但是，由于几十万敌人的疯狂“围剿”，和王明、康生对东北抗日斗争的干扰和破坏，年轻的东北抗日联军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东北抗日游击战争曾遭受了严重的挫折。但东北抗日联军在党的领导下，高举抗日救国的旗帜，历经千辛万苦，始终坚持了抗日

游击战争。

1945年8月，战略反攻开始，东北抗日联军配合八路军、新四军和苏联红军击败了日本关东军，解放了东北，取得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在十四年艰苦卓绝的东北抗日斗争中，杨靖宇等成千上万中朝人民的优秀儿女，为自己祖国的独立和民族的解放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们的可歌可泣的不朽的革命业绩，崇高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英勇斗争、坚贞不屈的革命气节和联系群众、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是永远值得我们学习的。

今天，我们已经开始了比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更艰巨、更伟大的新的长征。我们应该很好地学习和发扬先烈们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和优良作风，使它世世代代传下去，在为实现四个现代化和共产主义的壮丽事业中永放光辉。

陈 雷

1980年1月



魏拯民烈士传略

(1909—1941)

在吉林省桦甸县夹皮沟东部、牡丹岭西麓的二道河子抗联密营遗址，有许多树干都没有树皮。当今这些树干已成为珍贵的革命文物，它们是东北抗日联军艰苦斗争生活的历史见证。中共南满省委书记魏拯民同志和他的战友们曾在这个密营里战斗、生活过。在断粮的日子里，他们靠这些树皮维持了生命，坚持着斗争。在这里，魏拯民同志拖着重病之身指导东南满地区党的工作和抗日游击战争。在这里，他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熬尽了最后一滴心血，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望着这些不寻常的树干，崇敬和怀念之情油然而生。缅怀先烈的功绩，学习他们对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我们追寻魏拯民同志的足迹，回顾他光辉的历程。

—

魏拯民同志，原名关有维，字伯张。1909年旧历正月13日生于山西省屯留县王村一个农民家里。高小毕业后，他准备到省城继续读书，但父亲没钱，坚决反对他

升学。为了让儿子安心在家务农，父亲给他娶了个媳妇，以为这样就可以拴住儿子的心了。魏拯民又急又气，一下病倒了。外祖父听说外孙子因为上学的事急病了，就一口答应供他上学。1925年魏拯民考入太原省立第一中学读书。太原一中是一所富有革命传统的学校，校内有中共地下党、团组织，政治空气浓厚，许多同学倾向进步，秘密传阅进步书刊，经常参加社会上的革命活动。魏拯民入校后，很快就结识了许多进步同学并和他们一起参加了反对阎锡山征收苛捐杂税的斗争。魏拯民学习努力，接受新事物快。党团组织很注意对他的培养和教育。1926年他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1927年1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7年“四一二”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血腥屠杀共产党人。山西的土皇帝阎锡山也闻风而动，向共产党员和革命人民挥舞屠刀，一刹时乌云翻滚，白色恐怖笼罩了山西各地。太原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许多革命师生被投入监牢。魏拯民被学校开除，他心情沉重地回到家乡。反革命气焰嚣张，革命形势急转直下，这对每个共产党员、每个革命者都是一场严峻的考验。这时，拯民同志虽入党不久，但他没有被这股阴风恶浪所吓倒，他在家乡仍然坚持斗争。不久，组织派他到武汉找党中央接关系，他不畏风险日夜兼程地赶到武汉。由于形势恶化，党中央已转入地下，他只见到了农运部的一个同志，拿到些文件便返回了山西。

1928年夏天，魏拯民同志考入北平私立弘达学院，他一边学习一边进行党的宣传工作，撒传单、写标语、印材料，在同学中宣传党的主张。拯民同志办事机警灵活，善于动脑筋想办法。他把宿舍里铺地的青砖起下一块，在下面挖个小坑，把传单和文件藏在里面，这个办法既方便又安全。出去撒传单时常常是两三个同学互相配合，以问路、吵架等办法把警察引开，有时在人多的闹市竟把革命标语贴在警察的后背上。

在弘达学院这段学习生活中，魏拯民很少得到家庭的资助，生活非常艰苦。宿舍的几个同学知道他没有经济来源，常常帮助他，拉他一起去吃饭。因此他常找各种借口出去，躲开同学们吃饭的时间。有时他一天只能吃上一个三合面的窝窝头。这时他开始患了胃病，时常胃痛。不久，终因经济拮据而辍学。

1930年，军阀石友三为了网罗人材，在河南安阳办了所军事干部学校，并给学生以公费待遇。魏拯民得知后，于11月考入该校。这所学校里到处都是军阀作风和法西斯制度，学员不许请假，不许读报，看书要经过检查。每日操练无尽无休，学员稍有违章怠慢之处，便遭到野蛮的体罚。魏拯民对这所集中营似的学校十分厌恶和憎恨。校方的隔离政策，使他不能直接投身于社会上的火热斗争，但他的心仍和苦难的中原人民连在一起。他在1931年的一篇日记中写道：“军阀混战后，人民得到的‘洪福’、‘恩典’，使我们这些牛马式的人类无可告述。”

象这样的现象，我们还能忍受吗？还能忍耐吗？不能忍耐！只有一条路可以使我们走，我们走上去吧！”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使他产生了无穷的勇气和力量，他在法西斯专政的大棒下积极进行党的工作，利用“读书小组”的名义宣传革命真理，并秘密地发展了四名党员。他在日记中写道：“真正革命的人，作事要光明磊落，要作常人所不能做的工作，要忍受常人所不能忍受的苦。要革命要建设新社会，推翻旧社会，并不是容易可作，并不是无准备可以成功的。所以要作空前绝后的为人类的幸福的一桩伟大事业，必须在以前有充分的预备与准备，方可以有胜利之操，成功之可能。”1931年4月，魏拯民因患病不能出操，被军校开除。

拯民同志离开安阳回到北平与组织接上了关系，和老同学共产党员宋冠英同志住在一起。这时，宋冠英患严重肺病，拯民同志熬汤煎药精心护理，并抽空用宋冠英的学生证到北大听课。

“九一八”事变爆发，蒋介石下令不抵抗，眼看着东北的大好河山和三千万同胞沦落在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之下。魏拯民读着报道事变消息的《民国日报》，气得两手颤抖，一个血气方刚的年轻共产党员，一个堂堂的男子汉，能坐视国土被侵占，同胞受凌辱而无动于衷吗？他怀着激愤的心情投入到抗日救国的宣传工作中。迎着国民党军警的水龙挽臂前进的游行队伍中有他，在街头广场激昂演讲的同志中有他，夜晚编印传单小报的地下